

第三章

伪满洲国出笼

殖民统治形式的选择

哈尔滨沦陷的一个月后，伪满傀儡政权就出笼了，但关于占领后的东北殖民统治问题，早在1929年关东军着手炮制武装占领的作战方案时就已提出。当时，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中就曾具体地设想，对占领后的我国东北，也和台湾、朝鲜、关东州殖民地一样，设立军政合一的总督府；总督府设在长春或哈尔滨；总督由日本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下设幕僚长、道尹、宪兵司令官、师团长等。石原还主张，原有行政体制不作剧烈变动，以推行“以华制华”的统治方针。还要在东北常驻日军4个师团，以作“防卫”。石原的设计是极其粗糙的。更具体的方案由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炮制。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满蒙占领地区研究会。满铁调查课也通力合作。

日本参谋本部每年都提出一份《形势判断》，1931年度的《形势判断》包括了中央军部对武装占领东北的方针与步骤，其中提出了分三步走的计划。对三个阶段也相应地循序建立三种殖民统治形式：第一阶段建立取代张学良政府的亲日政权，但在形式上仍将其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之下；第二阶段“满蒙组成一个政权”，并从中国中央政府独立出来，建立由日本控制的国家；第三阶段占领“满蒙”，并将其纳入日本版图。但是，由于

“九一八”事变急剧爆发，实际上这三阶段设想只是提供了三种可供选择的形式，而这种选择在事变爆发的几乎同时就得做出。

1931年9月19日夜11时，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拜访了刚从日本来的住在沈阳十间房菊文旅馆的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继而又陪建川前往关东军首脑们居住的沈阳馆，与板垣、石原、花谷等会谈。建川本来是代表陆军中央前来制止关东军起事的，现在摇身而成为关东军制造事变的同谋。时值午夜，柳条湖事件发生刚过24小时。针对板垣、石原坚持主张实行第三阶段的占领方案，建川主张按《形势判断》规定的第一阶段方案实施，但表示对关东军的行动不加约束。^①第二天早晨，当建川往访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时又建议称，东北现政权崩溃后，建立以溥仪为首脑的、受日本支持的政权是得策的。这一天，9月20日以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伪市长的奉天市军政府成立。^②对此，日本政府和中央军部不无顾虑，它只能是过渡性的权宜之计。因此，当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进一步策划时，土肥原抛出了成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的方案。最后，经板垣、石原、片仓等人策谋和敲定的《满蒙问题解决方策案》规定：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统帝为首脑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受新政权委托，日本掌管国防和外交，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设施；内政和其他由新政权自行统治；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使之分别担任吉林、洮

①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其一。〔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第148页。

② 1931年9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布侵占沈阳后的第2号布告，宣布对奉天实施“临时市政”，任土肥原为市长，富村顺一为市秘书，庵谷枕为总务课长，鹤冈永太郎为警务课长，三谷米次郎为财务课长，守田裕松为卫生课长，等等。

索、热河、东边道、哈尔滨等地镇守使。^①这不单是纸面计划，也是具体行动。当日午后4时，关东军即通知日军驻天津司令官，把宣统帝置于其“保护”之下。一场大规模网罗汉奸和策动汉奸假独立的阴谋也立即开始了。

满铁的御用文人和满洲青年联盟的狂热分子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尽出谋划策之能事。1931年10月21日，满铁社员、关东军法制顾问松木侠抛出了一个《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这一设计蓝图把即将拼凑起来的伪国划分为6个行政区，日本除了因袭其所谓“条约上的诸权利”外，还要与伪国签定军事协定，并令伪国招聘日本人顾问。当时受日本陆军三长官即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委托，白川义则大将正在东北视察和慰问关东军，同行的还有日本参谋本部的今村均大佐。关东军幕僚们同今村均谋划，由片仓衷起草，石原、板垣修改，参谋长批准，向日本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明确要求：建立“与中国本土绝缘，表面上中国人统治，实权掌握在我方手里，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的独立新满蒙国家。”步骤是：“在辽宁省，建立靠我方内部支持的特别的新政府”；在此期间，迅速确立吉黑两省的亲日政权；“热河省则等待形势好转”；吉黑两省亲日政权成立后，立即实行“靠我方内部支持的该两省与辽宁省新政府的联合统一”，宣布成立“承认我方要求的新国家”，并以奉天为首都，这时根据形势的发展，热河省自始即使之加入联合统一。^②白川大将回国后，11月7日向日本天皇上奏，给关东军、满铁等说了不少好话。可是在这之前，11月5日陆军大臣对关东军已作了指示，说

①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其一。《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第189页。

②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其一。《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第232—233页。

关东军所提“方策”中关于伪政权与“中国本土绝缘”等项文字并不明确。这同对关东军军事行动的态度一样，陆军中央还是顾虑国际关系。可关东军却强硬地回报了陆军中央：关于“满洲政权不与中国本部绝缘之件，绝难以承服。”与此同时还上报了《满蒙自由国设立大纲》。该“大纲”也是出自关东军法制顾问松本侠之手。“大纲”出笼之前，10月23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还炮制了一个《东北自由国建设纲领》。两者内容基本相同，差异在于前者较后者详细。“大纲”与“纲领”的核心思想是：绝不能满足于只建立亲日政权，必须建立“满蒙国”。为了反驳前一种主张，“大纲”首先指责满铁，说20多年里满铁只顾会社的经营，而忽视了“满洲经营”；其次则谴责了“中国一贯采取的以夷制夷的传统外交政策”。“大纲”声称，不成立“满蒙国”而只搞个亲日政权，便不能“按帝国意图行事”。

“大纲”继而论证，既然只建立亲日政权不可行，那么可供选择的办法仅有两则：或者建立一个国家；或者“使之成为帝国领土之一部”。当然，从日本侵略者的主观愿望来说，“将满蒙作为我领土之一部，实属长策”。“但鉴于历史的渊源，目前如急于付诸实施，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的物议，恐非贤明之举。”^①由此可见，“大纲”的抛出，与其说是为了指导行动，莫如说是主要为了统一日本统治集团的意见。

“大纲”出笼后，适逢“九一八”事变史的转折期。十月事件和日本内阁改组后，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事变的态度不但更加一致，而且对关东军的不断扩大的军事侵略行动公开予以支持。所谓“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即使作为一个纯口号，也已成为历史的过

^① 《满蒙自由国建立方案大纲》1931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一卷“九一八事变”，第372—384页。

去。关东军在制造伪满洲国方面也采取了重要步骤：在11月8日开始的天津事变中，溥仪被偷运出津，带进东北。关东军进攻齐齐哈尔之后积极准备攻打锦州时，拼凑伪满政权的活动更加紧锣密鼓。在这之前，关东军的政治谋略、炮制殖民统治方案、夺取经济命脉等活动，都由司令部第三课掌管。1931年12月15日，也就是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关东军进攻锦州的当天，关东军决定设立统治部。这个与幕僚部并立的由行政、财务、产业、交通、交涉等5课构成的统治部，采取文治主义，七八十名部员大部分来自满铁和关东厅。部长驹井德三也是满铁出身，事变后经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推荐，于1931年10月任关东军财务顾问，实际上是政治、经济最高顾问，他参与了关东军的一切重要策划与谋略。按他建议而成立的统治部，接替了司令部第三课的业务，不但统辖了伪满政权的建立工作，而且成了伪满政权出笼前的代行机构。1932年1月9日统治部改称特务部。

关东军占领锦州之后，对于拼凑起“满蒙中央政府”更加急不可耐。网罗汉奸和策动假独立的阴谋活动当时已大致告一段落，但关东军统治部成立后20多天的活动却一筹莫展。面对这种情况，关东军决定派板垣赴东京同中央进行具体交涉。极力为关东军开绿灯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也正好有这种要求。板垣携至东京的方案已相当具体：“满蒙中央政府”将实行中央集权制；首脑冠以“大总统”之类头衔；避免“复辟”倾向；各行政长官以现任各省长充任。关于时机与步骤：先由各省派出代表设立政务委员会，“研究筹备”政府机构；然后由所谓的各省“民意”机关“推戴”首脑；政务委员会拟于板垣回东北后成立，伪政权至迟在8月末、即国联调查团来满之前建立起来。关东军的方案非常明确地载明，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名副其实的独立的伪国家；

可此事如“由日本直接去做，使之从中国本土分离，无论是九国条约，还是国联规约都是不允许的，但由中国人自身从内部进行分离，与上述诸条约精神是不背离的。”^①所以，如上那些步骤与做法都将操纵汉奸去做。在板垣到京前，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业已制定《时局处理要纲案》，其基本精神与关东军方案完全一致。荒木陆相急于要求关东军派人赴京，恐怕也就是为了磋商落实这一方案。由于意见一致，板垣到京后立即于1932年1月6日得到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外务省一致商定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并于1月13日由板垣带回沈阳。“要纲”明确地说“满蒙目前作为由中国本部政权分离独立的一个政权的统治和支配地区，逐步诱导其具有一个国家的形体”，为此“要谋求满蒙各省政权的确立稳定。特别是要比过去更加积极地给予援助。”同时，作为“强化统治力的一端”，“帝国臣民以顾问等形式”参加其中央和地方政治机构；“满蒙的国防主要由帝国担当”，日军至少增加到3个师团。而这一切“尽可能采取中国方面自发要求的形式进行。”^②

过渡性汉奸伪机构

无论日本侵略者对占领后的东北采取什么样的殖民统治形式，都离不开对汉奸的利用。因此，事变以来关东军网罗汉奸投降派的阴谋活动，从未松懈。当时冒出来的汉奸伪机构是过渡性的，对正式建立伪满政权乃是一种准备。

① 《对板垣赴京时的指示》，1932年1月4日。〔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第333页。

② 该“要纲”后来于1932年3月12日由日本内阁通过，文字有些变动。

沈阳亦称奉天，是东北政治经济中心，关东军网罗汉奸和制造伪满傀儡政权的活动，自当都以奉天为中心进行。事变当时，执掌奉天军政大权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奉天省长臧式毅，一个乔装逃离奉天，一个为奉天日本宪兵队所逮捕。^①1931年9月21日，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为首的奉天市军政府成立，当天下午强迫沈阳市长李德新交出政权。日本侵略者用刺刀控制起奉天之后，便在闲散的旧官僚、旧军阀和形形色色的亲日分子中，开始紧张物色、罗致汉奸了。9月25日一个名为辽宁省地方维持会的伪组织便应运而生。委员长是袁金凯，副委员长是阚朝玺。袁金凯是奉天官场中辽阳派首领，奉系官僚文治派代表人物，张作霖任奉天督军时曾为张的秘书长，第一次奉直战争后被直隶派政府任为奉天省长，但为避免张作霖的嫌忌而未就任，居闲大连，后被任为张作霖镇威上将军公署高等顾问兼清史馆编修，事变前夕实际已处于隐退状态。阚朝玺，辽宁省盘山县人，早年从张作霖，第二次奉直战后任热河都统兼第三师师长，郭松龄反奉时有通郭嫌疑为张作霖所忌而退官，尔后虽又任奉天军总执法处长，但在张作霖死后闲居大连。委员中包括：原中日合办弓长岭铁矿公司总办丁鉴修、曾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参议的于冲汉。这群卖国汉奸之所以同日本侵略者一拍即合，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有着自己亲日或媚外的丑史，甘心受外国侵略者的摆布。委员会最高顾问是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他才是委员会一切的主宰者。维持会名义上是“维持地方秩序和地方金融”，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拼凑伪政权的工具。

在省城奉天以外，日本侵略者在辽宁省网罗汉奸的主要目

^① 臧式毅被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软禁在沈阳大西关五经路鲍文樾宅楼上。他为南京方面参谋次长。

标，东边是于芷山，西面是张海鹏。

于芷山原为张作霖手下的一个军阀，第一次奉直战争时任第八师师长，后任张作霖卫队司令和侍从武官长，第二次奉直战争时在张作相的第五军团任第三十军军长，曾进驻山西北部。事变前夕，作为辽宁省两个镇守使之一——东边道镇守使，率省防军一个旅的兵力守护辽宁东部。关东军为了策反于芷山本人和于所统辖的那块地盘，1931年9月24日即派大矢进计潜入于的部队。但因东边道地处边陲，事变后又有奉天第七旅和奉天讲武堂学生队官兵退集于此，被改编而分驻于兴京、柳河、山城镇等地，抗日士气高涨。所以，于虽受策动，但态度暧昧，一脚踏两只船。10月初，关东军曾派独立守备第二大部的部分兵力从抚顺出发“讨伐”于部，于巧于应付，日军并未深入。迫使于芷山降服起决定作用的是谋杀张作霖的元凶河本大作。1931年12月中旬，他带领几名关东军特务和十余名满铁社员前往东边道，夺取辽源煤矿，兼向于芷山策反。河本一行在辽源受到500名县公安队的包围袭击。而正在敌我之间徘徊犹豫的于芷山，竟派8个连的骑兵解救了他们。河本便利用道谢机会对于百般劝诱，回奉后又拨款、拨枪。另外，臧式毅被释降敌之后，奉关东军之命曾派伪省署秘书长赵鹏第去东边道进一步劝诱，于才投敌到奉。

张海鹏降日较早也颇为痛快，这和他的丑恶历史与思想有关。如前所述，他是冯麟阁（即冯德麟）的后辈，曾报号“大海”，打家劫舍，为匪作恶，与冯等被招抚后，很快爬到第二十八师五十五旅旅长的高位，后又任东省护路军哈满司令、哈绥司令、奉天第一游击队统领等，事变时为洮辽镇守使，率一个旅驻守洮南一带。由于他在日俄战争时期就曾充当日军特务，民国时期又怀有强烈的复辟思想，所以备受日本侵略者的青睐。而在关东军对

他进行策反的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素与其有往来的满铁洮南公所河野公所长。9月25日，去吉林与熙洽联系的今田新太郎也转道抵洮，参与策动。当时关东军进攻哈尔滨的计划受阻，故积极试图假张之手夺取黑龙江省。1931年10月1日，野心勃勃的张海鹏经过对要求抗日的兴安屯垦军左右逢源，和向锦州方面摸底之后，终于露出真容，以边境保安司令的名义宣布与张学良的东北政权断绝关系，开始向黑龙江省伸手。

土肥原的奉天市军政府只短命地生存一个月。1931年10月20日关东军即将市政移交给了伪辽宁省地方维持会，取代军政府成立了以赵欣伯为市长的伪奉天市政府。赵曾留学日本，混得法学博士，曾任日本陆军大学汉语讲师，当过张作霖的法律顾问，是与日本侵略者过从甚密的亲日派。事变后积极替日方奔走。出任伪市长后，在日本人顾问的操纵下，沦为制造伪政权的得力走卒，极尽出谋划策之能事。

作为辽宁全省的伪组织地方维持会，虽已挂牌并开始活动，但尽是利用一群过了时的政治垃圾、旧派人物，对日本来说未免有伤体面。尤其在锦州张学良政权早已成立并广泛开展活动的情况下，用一个维持会与之对抗，是苍白无力的。何况，日本侵略者还妄图用辽宁省带动吉黑两省。所以，他们反复策划，觉得可资利用的辽宁省代表人物，还是被他们监禁中的臧式毅。事变时臧系辽宁省主席，之前，曾任奉天镇威上将公署少将参谋长兼奉天兵工厂总办，是个实力派人物。由于他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关东军估计他有降从的可能。然而，在赵欣伯出任伪市长时，臧未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只好还得暂令伪辽宁省地方维持会代行伪省政府事务，并于1931年11月6日指使袁金凯贴出布告，宣布与张学良政权和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实行所谓

“独立”。当时，不仅伪省政权没有建立，省内各市县更远未建立起殖民统治。尤其邻近锦州张学良政权的地区，更非日伪的天下。而数量有限的关东军又东征西侵，鞭长莫及，顾不上更广大的地区。实际上，当时的锦州张学良政权仍与东北各地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针对这种局面，日本侵略者开始巧用“自治”美名，向各县渗透，以拼凑各省伪政权。也就是施用政治手腕弥补其武装占领力量之不足。在这方面，大汉奸于冲汉竟被充分利用。于冲汉与袁金凯、王永江同为奉天派的三元老，日俄战争期间曾为日军刺探俄军情报，充当日军间谍，当时张作霖也在为日、俄军效力。民国初期，于冲汉当过张作霖的第二十七师总文案和顾问，以及东三省官银号总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满铁攫得鞍山一带铁矿，即借助于于冲汉和张作霖之力。事变时于冲汉虽然正在家乡辽阳养病，但是1931年11月1日奉天日本侨民会长守田福松衔着关东军的秘密使命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不但欣然允诺带病出山，而且还胸有成竹地提出八条政见，高唱一番所谓“善政主义”。这一套正是侵略者急需的进行殖民统治的招牌。10天之后，11月10日，以于冲汉为部长、日本人为主体的伪自治指导部在奉天出笼。^①从此，多数为满铁社员、满洲青年联盟盟员和大雄峰会会员出身的自治指导员，陆续前往各县拼凑伪自卫团，建立伪警察队，讨伐镇压，假“自治”之名拼凑和操纵地方伪政权。自治指导部面世后，关东军又进一步策划改组辽宁省伪组织问题。特别是1931年12月中旬对马占山的怀柔露出一线希望之后，对在押中的奉天实力派臧式毅的逼降工作积极起来。附带说

^① 除部长于冲汉，顾问中野虎逸、中西敏宪外，下设各部。总务部长结成清太郎，社会部长笠木良明，调查部长中西敏宪，指导部长牧野克己，监察部长和田劭。于冲汉之子于静远曾任自治训练所所长，其前任是中野虎逸。

明，锦州方面并未免去臧式毅的职务，只因其被监禁而无法履行职务，所以日本侵略者急于启用臧式毅，也是为了同张学良争夺群众。1931年12月15日，被剥夺自由8个月的臧式毅终于屈膝投降，在板垣早已给他准备好的卖国文件上签了字：“1、要我参加东三省政权组织，充任官吏；2、日本军队驻在东三省内；3、国防由日本军队担任；4、东三省分担日本驻军军费；5、东三省境内铁道由日本经营、使用。”^①一夜之间，臧式毅由一名阶下囚重又登上奉天省伪省长的“宝座”。伪辽宁省地方维持会也为伪奉天省政府所取代。可日本人最高顾问一仍其旧。^②

在吉林省，熙洽早于袁金凯一个半月即宣布“独立”，态度也比袁积极主动。原因很简单：熙洽不但是利欲熏心的军阀官僚，而且是处心积虑梦想复辟的爱新觉罗皇族，故在事变期间表演得最为充分。当然，熙洽的快速降敌也是侵略者紧张策动的结果。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决定启用熙洽的当天，即派今田新太郎大尉去吉与熙洽联系。翌日，业已侵入吉林市的第三师团长多门二郎、顾问大迫通贞与今田大尉会合，一齐迫使熙洽同意组织伪政府。而板垣早已用电报将罗振玉从大连叫到奉天，在多门等与今田在吉林会合的当天晚上，板垣又驱使罗赴吉与熙洽联系。27日伪省政府人事安排就绪，28日宣布所谓“独立”。

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实行军政合一，熙自充长官，总揽军政大权。其下伪军政厅长郭恩霖、伪民政厅长王惕、伪财政厅长孙其

① 1954年8月9日臧式毅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一卷“九一八事变”，第360页。

② 最高顾问仍为金井章次，另外还设日人顾问色部贞（财政），高井恒久（实业）、阿比留乾二（法院）、中野虎造（奉天市）。还设有日本咨议多人。

昌、伪教育厅长荣孟枚、伪实业厅长张燕卿^①；此外，宗社党头目肃亲王第七子金璧东任伪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兼吉长、吉敦铁路局长。这一群卖国汉奸无非是侵略者手中的工具。和伪奉天省政府一样，伪吉林省的省政实权掌握在以大迫通贞为首的日本人顾问手中。^②

熙洽从敌和宣布所谓“独立”后，关东军又通过大迫通贞令其策动“间岛独立”。间岛即延边，那里驻有延吉镇守使吉兴的省防军第十三旅。吉兴与熙洽是皇族兄弟，关系非同一般。但向吉兴策反的首先还是日本侵略者。事变第二天，离延吉40里的龙井特务机关长河野即开始策动吉兴。几天后，熙洽又致电吉兴，告以吉林机关已改为军政长官公署，限期令其从伪。吉兴供称：“这正符合我早就打算好的投降的心意，于是马上召集部下三个团长会议，我表示投降，其中朱榕团长表示抗日不投降，但我对他用引诱和威胁手段制止他的抗日行动，以避免军队反正抗日。后我把电报命令宣布，把延吉镇守使公署改为延吉警备司令部，我任司令官，率部队三个团就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了。”^③一周后，关东军派植野宪兵大尉充当警备司令部顾问。

在黑龙江省，因碍于苏联等国际关系，和存在着复杂的政治情况，关东军采取控制哈尔滨以攫取全省的侵略方针。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哈尔滨不属于黑龙江省，而是中东铁路沿线特区的首

① 郭恩霖原为吉林陆军训练处参谋长；王锡原职务不详；荣孟枚原为吉林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公署秘书；孙其昌曾任吉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张燕卿原为吉林实业厅长。

② 最高顾问是关东军司令部附大迫通贞中佐；顾问有：滨田有一、三桥政明、花田孙平（民政）、宇山兵士（财政）、饭田重一（实业）、桥口男九郎（教育）。

③ 1954年5月6日吉兴口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一卷，“九一八事变”，第217页。

府，即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所在地，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在包括黑龙江省在内的整个北满处于执牛耳的地位。而“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恰好身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张景惠正在沈阳。这个一身软骨的汉奸，关东军稍加利诱便迅速上钩，从而成为侵略者夺取北满政权的最大帮凶。张景惠与张作霖一样，绿林出身，当过团长、旅长、师长，和张作霖政府的陆军总长、实业部长。1926年6月，皇姑屯事件时与张作霖一道被炸，腿部受伤，愈后被任命为东省特别区长官，是东北实力派巨头之一。事变时，他刚参加完南京会议和为张作霖吊丧而回沈。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决定利用张景惠的当天，板垣征四郎便通过张之内弟徐宝斌相识的新井宗治牵线与张接头，要求张与日本合作和“负责维持北满治安”；板垣答应将让张成为黑龙江省最高负责人。张立刻允从，并由新井伴随于9月24日回哈。当夜即在自己宅内召开各方面代表会议，决定：（一）自力“极力维持治安”；（二）对日军绝对采取不抵抗主义。三天后，9月27日张自任会长的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成立，并当即贴出布告称：“尔后本特别区一切政务及维持治安，由本会负完全责任。”^①张之所以敢于宣称“负责维持治安”，是因为他在沈阳时关东军已答应拨给3000支步枪，而这批枪，9月30日即从长春领到。10月上旬，以于镜涛为队长的警察队成立。于原为特区警务处副处长兼警察学校校长，系张的心腹。关东军利用张景惠建立武装，与其说是为了哈市的治安，莫如说主要是为了对付当地中国驻军抗日。所以，关东军虽暂时未能侵入哈尔滨，但因张景惠已倒向日方，实际上

^① 满铁哈尔滨事务所：《关于哈尔滨等地情况的记事》，1931年9月19日至10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一卷，“九一八事变”，第288页。

关东军在那里已拥有势力。

关东军原来是企图利用张海鹏染指黑龙江省。可是，事变前的张海鹏只拥有装备陈破的两千兵。江桥战役一败涂地，再也没有力量和士气同黑省军抗衡。而关东军经过大兴、三间房和齐齐哈尔战役后，虽然已占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马占山也已率部撤向海伦，但是由于日本仍顾及苏联关系，第二师团主力于11月27日不得不撤离齐齐哈尔，而仅留下300人的小部队。关东军退出后，计划任命张景惠为黑省主席和以张之力击溃马占山军。事实上，张已派英顺^①率警备队进入齐齐哈尔。可是，张景惠在第二师团主力撤出齐齐哈尔之前就已经踌躇起来。因为，他既怕日军撤退后难以支撑，又缺乏必要的资金维持局面。张景惠还是希望怀柔马占山，与马合作降日，否则黑省部队能否调遣不无疑问。关东军也深知此点。

关东军就是以张景惠动摇为借口而在齐齐哈尔留下小部队的。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和中央军部还是小心翼翼地决定：关于黑龙江省的政治谋略，由关东军统治部文职部长驹井德三进行，实际上板垣直接插手。马占山率部退至海伦一带后，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部队抗日士气大振。同时，以原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为首的设在宾县的抗日的吉林省政府也已开始办公，广大群众深受鼓舞。而日本方面又急于扑灭在锦州的张学良政权，积极准备进犯辽西。在此种形势下，关东军惟恐马占山与张作相联手，夺回齐齐哈尔，因而怀柔马占山的活动突然紧张起来。1931年12

^① 英顺，又名积华，吉林省人，夙为张景惠随从，曾任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副处长，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名誉顾问。

月7日，经张景惠、赵仲仁^①、韩云阶^②等人一番活动，板垣、驹井等不经马占山同意，突然出现在海伦的马占山总部，他们是从哈尔滨出发的，同行的还有中外记者十余人。马占山迫于形势，恐日本“以重兵消灭我军，处于不得已，与日人虚与委蛇。”^③从此，马占山便在一段时间内对敌人采取“相机应付，缓敌进击”的方针。按约定，1931年12月10日，马占山由海伦抵呼兰，先由参谋长谢珂入哈，经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的谋策，在松浦镇实现了张景惠与马占山的对话。对话内容至今仍是谜。据12月14日马占山对英国记者谈，他当时曾劝告张不要帮助敌人。而日本侵略者却说，马占山当时表示服从张，拥张为黑省主席，以后断绝同南京政府、同万福麟的关系。可是，当12月26日板垣、驹井一行抵哈会见张景惠，令张召马再来松浦镇时，马未应允，反而要求板垣一行再赴海伦，板垣也予拒绝。在这种局面下，12月28日晚板垣等只好单以张景惠为对手，策划于1932年1月1日黑龙江省发表“独立宣言”等问题。不过，12月28日当天板垣等却会见了韩云阶和谢珂参谋长，要求他俩回海伦再次敦促马占山来哈。马虽未来哈，但由韩云阶带了回信，表示对以张为首的黑省政府并无异议。

1932年1月1日，张景惠仿照辽、吉两省政府的办法，以个人名义发出通电，宣布所谓“独立”。张与熙洽、臧式毅一样，值此时刻，出卖了一批利权。1931年12月28日，张景惠同板垣签署了军事、铁路、日人居住和设置日警等一系列备忘录。

① 赵仲仁，龙江县人，曾任宾州铁路局长，1930年在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后又任国民会议黑省代表。

② 韩云阶，旅大金州人，曾留学日本，事变前从事实业，任亚细亚面粉公司总办等职。

③ 马占山等：《黑龙江省抗日战斗详报》，1934年4月。

伪黑省政府出笼前夕，马占山并未明确表示降日，张便不待马发出通电即就任了伪省主席。但是，张景惠并无武力，态度也较暧昧。只是关东军急于向中央汇报，权且支持张。而且，由于锦州失陷，和关东军大举进攻北满之态势业经形成，使马占山确实感到有受两面夹击之虞，思想上不免有所动摇。1932年1月6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把马占山召致松浦镇，与驹井德三、村田顾问会见。马表示同意与张合作建立东北政权，并拥戴溥仪为首领。当夜张景惠即去齐齐哈尔。7日晨，张在齐拜会了日军、领事和满铁代表，然后在伪省政府宣布就任伪黑省省长，铃木旅团长和满铁公所长当时在场。张的使命就在于引诱马占山出山。没有马占山，日本侵略者无法收拾黑龙江省的局面。因此，张宣布就职后，以会见芳泽大使为词，把职务交吉祥^①代行，当夜返哈，英顺所率警察队也随之撤走，并把伪省署的大部分空缺留给马占山一派。1932年1月中旬马军人齐齐哈尔。先期入齐的原张宗昌部下王殿忠伪军被调至辽西，守护奉山铁路。马占山任黑省伪警备司令，并准备接任伪省长。^②

溥仪出津

1932年1月6日在哈尔滨松浦镇同马占山的会见，板垣征四郎没有参加，他当时已去东京汇报。如前所述，1月13日板垣由东京带回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是日本政府与军部关于以溥仪为首脑建立伪满洲国的决策。

至于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始终坚持并一致主张以溥仪为

① 吉祥，又名德纯，龙江县人，清末任黑龙江巡防队统领，民国时期任黑省旅务所总办和清乡督办。

② 伪黑省最高顾问为村田德三，顾问有平田骐一郎、山口重次。

伪满洲国的首脑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东北是清室发祥地；旧王公贵族和封建势力对废帝溥仪仍抱有忠诚；利用“帝国之尊”得以消弭军阀官僚的权力追逐，等等。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条：被日本长期豢养过的溥仪，已使侵略者相信，他是易于驾驭的，完全能够甘心充当傀儡，而这一点，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物色代理人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①

1911年12月25日，溥仪当完了最后一天清朝皇帝。但根据民国临时政府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例，他照旧在紫禁城内过着朝廷生活，溥仪当时年仅6岁，不会感到帝王生活的变化。甚至直至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溥仪的帝王尊严和“宣统”年号，在故宫内依然如故。但是，及至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军进京“逼宫”，溥仪不得不“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和“即日移出宫禁”时，其政治生活则发生了重大转折。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开始向他伸手。溥仪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在行动上越来越受自己的思想支配，但仍不能脱离周围环境的影响。溥仪出宫后，本来移居在北府，即其父载沣醇亲王府中。1924年11月29日，却在罗振玉、郑孝胥、庄士敦等人策划下，从北府潜往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在使馆小客厅里，溥仪虽可继续接受众臣的三拜九叩，但使馆毕竟非久留之地。1925年2月25日，又经日使馆池部书记官与罗振玉密谋，以准备“出洋”名义，把溥仪弄到了天津。此时的溥仪，投靠日本，已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他自己的思想倾向了。溥仪在天津，先在张园住5年，后迁至静园住两年。^②7年间虽非“出洋”，但

① 据河本大作1958年4月4日供称：1929年秋日本军部即决定在“满洲问题”上起用溥仪。日本军部认为：溥仪不可能投靠其他人，起用溥仪对外便于伪装；溥仪对“满洲”始终怀有感情。

② 张园是因辛亥革命而下台的清末官僚张勋的住宅；静园是北洋官僚陆宗舆的宅第。

也与侨居国外无异。溥仪是同妻妾生活在一起的，却无行动自由。日本方面利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对溥仪采取了严格的警卫措施，这不能说不是出自安全上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把溥仪这位末代皇帝作为政治上的“奇货”紧紧地抓在手里，不愁派不上用场。

天津时期的溥仪，簇拥在他周围的仍然是从紫禁城和北府跟随之而来的那帮清室余孽。除此而外，驻天津的日本领事、日军司令官、日本特务，以及过往天津的日本达官显贵、军阀政客，越来越多地成为溥仪的座上客。至于日本驻军参谋、部附们，更是不厌其烦地向张园以至静园里钻。当时日本拉拢溥仪，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和不计工本的。每逢日本“天长节”溥仪必受邀请参加阅兵。一次，日军植田司令官特意骑马走到溥仪面前敬礼。这位刚刚20岁出头的逊帝受宠若惊，情不自禁地跟参加检阅的亲日派们一道喊起“天皇陛下万岁”了。1927年北伐军北上，恐惧病复发的溥仪与罗振玉商量，决定赴日躲避。日本政府当即表示“仍以外国君主资格待遇”。后来因陈宝琛等人反对乃作罢。日本方面所做的一切，显然都是为了在溥仪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亲日的种子。但对溥仪这个特殊人物来说，把亲日思想变成亲日行动，只有复辟才有可能。日本侵略者对这一点也并不隐讳。诸如河边、金子、吉冈等日本军天津司令部的参谋们，每次对溥仪进讲得出的结论几乎都是：中国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群龙无首，没有皇帝。1928年5月，蒋介石北伐军逼进华北，张作霖势在返奉。值此时刻，天津日军特将关东军司令官对蒋介石、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等南北两军的通告，抄送给溥仪。通告蛮横地声称：“现值支那内乱”，“故对满洲一带之帝国侨民当取充分的保护，特设警备区数处。凡支那军欲通过者，悉予解除武装，若敢加害帝国侨

民生命田产者，本司令言出法随，立当严办，决不姑贷。”^①日军拿来这一纸通告自然不是恫吓溥仪的，而是示意日本“强大”，把蒋介石等人都不放在眼里。联系罗振玉等人经常向溥仪宣传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如何“富强”“文明”，以及日军参谋们对中国政局千篇一律的剖析，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反复向溥仪展示这样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公式：由日军的强大武力征服中国领土，靠溥仪的政治效应拢络统治民心。

溥仪也是个有血有肉的自然人，然而，由于历史和环境关系，他的人格比任何人都更加政治化了。天津时期的一切助长了他的复辟野心，也确实更加亲日化了。为了“重登大宝”，溥仪对白匪头子谢米诺夫都很动心，甚至还把谢匪与山东军阀张宗昌撮合起来。1929年，关东军的武装占领东北的计划已着手炮制，起用溥仪的问题也提到日程。这年秋天，因皇姑屯事件而转为预备役的河本大作，经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同意，赴旅顺与板垣、石原密商后，乘船溜进天津，住入日租界美桑馆。据河本说，他当时通过某人牵线，在英租界溥仪的亲戚家会见了溥仪，溥仪还提出一些问题，并表示可提供一部分费用。此事是否属实虽无第三者证明，但据溥仪回忆称：当时河本确实想通过名叫费毓的人与其谋面，只因近臣反对而作罢。

“九一八”事变后的溥仪更加跃跃欲试，心急如火。1931年10月，在溥仪身边的家庭教师远山猛雄策划下，溥仪给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和黑龙会头目头山满分别送了亲笔黄绫信，要求“加以指导”，由远山专程回国送交。应该说，溥仪的这种急不可耐心理也是日本侵略者拨弄起来的。前面说过，事变后的9月

^① 1928年5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通告中国南北军各将领文。《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一卷，“九一八事变”，第57页。

22日关东军决定起用溥仪，当天即电告天津日军把溥仪“保护”起来。与此同时，罗振玉从大连被召至奉天。罗的使命是，立即赴吉，到熙洽那里去取请溥仪“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先据东北，再回关内”的信件。罗于9月26日回奉，翌日即伙同板垣的亲属和代表上角利一前往天津。9月30日，溥仪被召到海光寺天津日军司令部，面见罗和上角，香椎司令官也在场。溥仪接过信后，表示回去考虑。香椎说天津治安情况不好，希按板垣意见前往东北。但溥仪身边的陈宝琛和胡嗣瑗向来怀疑日本，反对溥仪去东北，并说罗所说的日军舰迎接决不可信，其中有诈。因此，天津日军再次找溥仪谈话，亦无结果。溥仪虽然不能不环顾左右，但心里蠢蠢欲动，于是在远山策划下给南次郎等写了上面所说的那封黄绫信。1931年11月4日关东军获得情报，说溥仪有意去东北。在这之前，土肥原赴天津对溥仪进行了策动，他表示“日本没有领土野心”，一切由“宣统皇帝完全作主”。当溥仪追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时，土肥原答称：“当然是帝国”。溥仪允诺后，土肥原让溥仪于11月16日前到达东北。然而，障碍出现了：一是日本海军态度消极，利用军舰运送的计划破产；二是日本统治阶级集团对事变的政见尚未完全统一，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严密监视溥仪，不准离开。就在这种事态之下，天津事变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在华北实施的谋略是两重的，即除图谋将溥仪偷运出津外，还一举击溃在华北的张学良势力，甚而还妄图进一步夺取全华北。为实施此谋略，1931年10月10日关东军就酝酿把土肥原派进天津军。及至10月20日，关东军更加认为迫使张学良势力崩溃，刻不容缓，故立即派土肥原去津建立关东军在华北的有力机关，以“推进反学良运动”的计划。破坏活动是从东北和华北两方面进行的，中枢自当是天津军军部。10月

30日关东军即拨给天津军步枪1000支，子弹20万发，手枪500支，子弹5万发。与天津谋略同时进行的还有对马占山的所谓北满谋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意图是，等北满方面稳定，也就是夺取黑龙江省之后，再将溥仪弄出天津。可是，土肥原急不可耐。1931年11月8日即挑起天津暴动。当晚10时半，突有携枪便装中国人2000余人在日租界海光寺集结，11时余百余人冲出，袭击中国警察所，接着又有大批便衣队冲出租界，向市政府和公安局进击。中国保安队理所当然地进行抵卫。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将事态通告了各国领事，要求日本总领事取缔日租界来路不明的便衣队。但至翌日晨，天津日军司令部却要求王主席在上午6时前，将中国军队和保安队退至距日租界300米以外的地区。此时日军已占领了日租界周围的中国街。王主席同日军司令官交涉时，又有大股便衣队冲出。5时30分日军逼迫撤退。王主席为避免冲突，从之。中国方面在现场并无军队，全系保安队；保安队撤退时已击溃了从日租界冲出便衣队。土肥原当时既操纵了失意军人张璧和石友三部下李际春，又收买了杨元吉一伙匪徒。但因他事先准备失误，至使杨元吉一伙匪徒耽误未能参与行动，结果张璧、李际春等所谓治安维持会派抢先发动，未能像预先策划的那样，占领天津各要冲，破坏杨村铁桥，接应韩复榘，酿成席卷华北的大暴动。^①由于土肥原叫苦，关东军给天津事变输血打气^②，所以，11月9日受挫的便衣队重又嚣张起来。“佳蒸两夜及真晨（即11月10、11日夜及12日晨），该便衣队仍不时出动，猛攻我一区

① 1931年10月初关东军就策划利用韩复榘攻击张学良的东北军，为此计划曾给韩步枪10000支。

② 1931年11月10日关东军司令部决定再向天津拨6.6毫米子弹100万发，现款20万元。

六所辖境及南开、马厂、北洋火柴公司各处，均经击溃。”^①11月13日以后暴乱才被平息。暴乱中，中国官警阵亡6人，负伤37人，死伤无辜市民70余人；便衣队活动猖獗地区10000多居民流离失所^②。全华北也遭受很大骚乱。北平发生挤兑风潮，河北全省一度戒严。但是，日本侵略者只实现部分目的，即将溥仪偷运出津。

溥仪是11月10日被日军偷运出天津的。前此，曾有一陌生人送给溥仪一筐水果，从中发现两颗炸弹，日本警察拿走后告知称，炸弹是奉天兵工厂的产品。溥仪还接到过恐吓信。因有此类情况发生，天津日军翻译吉田忠太郎力促溥仪动身。土肥原已限期，溥仪必须在11月16日前到达东北。溥仪曾称，他自己也设想过潜离静园的办法，不走大门，从汽车房乘车而出。但因车房门已被招贴广告糊死，只好按随侍祁继忠的主意，让溥仪委曲地钻进一辆只有双坐的敞篷汽车的后厢，开出静园。车到日本饭馆敷岛料理店后，溥仪被打扮成一个日本军人，由吉田忠太郎陪同改乘日军司令部的汽车，畅通无阻地到达英租界的一个码头。在那里，他们快步登上一条没有灯光的小船后，发现郑孝胥父子、上角利一、日本浪人工藤铁三郎都早已上船。小船闯过中国军队的检查后，夜半驶进大沽口，然后一行换上日本商船“淡路丸”，11月13日晨靠到营口码头。等在那里迎接的是化名内藤雅男的日本浪人甘粕正彦。甘粕先把溥仪等送到鞍山邻近的汤岗子翠阁温泉旅馆，后因那里易遭辽南义勇军袭击，乃于11月18日转送到旅顺海滨

① 1931年11月12日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天津市长张学铭呈文。《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一卷，“九一八事变”第479页。

② 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便衣队暴乱》，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8、21页。

大和旅馆。在这之前，11月13日关东军便就溥仪离津赴东北一事通告关东厅、满铁等日方机构，通告规定溥仪“禁止从事政治活动”、“与外切断交通”、“溥仪一切情况禁止发表”等等。^①

土肥原之所以未按本庄繁的意志行事，急忙制造烟幕把溥仪弄到东北，原因之一是恐怕夜长梦多。同时，关东军把溥仪搞到手，也等于掌握了极其重要的政治筹码。只要溥仪踏上东北土地，关东军就不怕日本当权派有什么不统一。事实上，溥仪出津之后，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在对事变的态度上完全转趋一致。驻天津日本总领事遵照币原外务大臣的指示，对溥仪的去向也采取了“听其自然”的态度。不过，溥仪暂时派不上用场，只好过着与外界隔绝的软禁生活。皇后婉容，是由于表示强烈的不满，关东军才派川岛芳子将其秘密带出天津，到旅顺与溥仪共同生活。^②

用刺刀导演的“建国”闹剧

1931年末，溥仪从旅顺海滨大和旅馆被转移到旅顺肃亲王府。1932年初关东军占领锦州，从此由军事进攻转向以拼凑伪满傀儡政权为重点。如前所述，板垣于锦州占领后的第二天即1月4日去东京，13日返回东北，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和军部确立了关于炮制伪满政权的大政方针。关于伪满政权成立的具体时间确定为2月中旬，至迟2月末3月初国联调查团到达前必须建立起来。但是，由于怀柔马占山和须从吉林自卫军手中夺取哈尔滨，使伪满“建国”的筹备工作不能不有所拖延。利用这个空档，从1932年1月

① 1931年11月13日关东军通牒。《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第265页。

② 1931年11月下旬川岛芳子受板垣派遣乔装男人入津，一天夜里川岛亲自驾车，将婉容塞进车后厢，关闭车灯，送至码头。

15日起，关东军邀请日本国内知名学者召开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产业、金融等方面的“咨询会议”，分别就法制、币制、金融、关税、专卖、税制、矿业、农业、畜产、工业、商业等，为东北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出谋划策。穷凶极恶的关东军也明白，对于1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数千万人民的统治，光靠枪杆子是不行的。1932年2月初所出现的形势，使关东军制造伪满政权的步伐大大加快。一是2月5日关东军侵入哈尔滨，这意味着武装侵略行动告一段落；二是“一二八”上海事变已进入激烈阶段，日本侵略者把世界注意力引离东北的目的已经达到。

拼凑伪满政权，在做法上最重要的是，必须在形式上装扮成中国方面自发进行。为此，自2月10日起关东军连续召开10次幕僚会议。这些幕僚会议，无非是研究落实1月22日高级幕僚研究的和板垣于1月27日拍板确定的伪满“建国”步骤，这就是：（一）由奉吉黑三省汉奸主席组成伪中央政务委员会；从事筹备工作，张景惠任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任委员，熙洽兼干事长；（二）由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与中国中央分离；（三）伪政务委员会随时召开，但伪满政府筹备工作在吉林进行；（四）伪满“建国”筹备工作事项包括：国号、国旗、宣言、人选分配和首都；（五）筹备妥当之后，由政务委员会作出决议；（六）伪政务委员会决议，必要时交各省“民意”机关，求其同意；（七）各地都要“推选大总统”；（八）“民意”通过请愿和推举表现出来；（九）伪政务委员会按所谓“民意”动向，建立伪中央政府；（十）伪大总统组织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发布条例；（十一）伪政务委员会要求内蒙、热河派代表参与决议，迅速与伪国家合流。^①至于所要公布发表的“宣言”“条例”等等，

^①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力寸寸书房，第367页。

实际上主要出自满铁御用文人之手。

关东军未等筹备就绪就纠集各主要汉奸成立了伪政务委员会。当时马占山的态度是关键所在。1932年1月22日，马军虽已开进齐齐哈尔，但以新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为首的日军特务，伙同汉奸韩云阶等，仍在继续做马的怀柔工作。2月13日，马终于出现在哈尔滨，并在宴会上会见多门、板垣和驹井。板垣因得到马的同意，决定2月16、17日在奉天召开政务委员会。熙洽最为积极，14日下午即抵沈阳。张景惠与板垣同机由哈飞奉。最后，马占山于16日下午飞抵沈阳。按关东军参谋片仓衷的策划与导演，当日下午4时，张、熙、马、臧访问关东军司令官。此前，汉奸赵欣伯秉承关东军的意旨，已对臧、熙进行了会前工作。于是，他们在拜会关东军司令官后，紧接着于晚8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除张、马、熙、臧外，还有板垣和中岛翻译官，会议持续开到17日凌晨3点。这次会议决定：为避免与中国原东北政务委员会混同，采用东北行政委员会之名，会场流动，设委员长，人选酌情而定，17日正式成立，17、18日发表宣言，署名者除张等4人外，增加汤玉麟、凌升、齐王等，为将伪满政权一气呵成建立起来，熙、马代表留驻奉天，伪首都设于长春。17日晚召开第二次会议后，按预定于18日午后8时，以汉奸张景惠名义发表了关东军草拟的《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宣称：“从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2月20日，伪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伪满国体、国号、国都等，会议分歧。吉林的熙洽，因系皇族，复辟思想严重，强烈主张帝制；奉天的臧式毅要求实行立宪民主制；而张景惠则表示哪种国体都无妨。其实，他们争论是徒费唇舌，关东军的方案早已决定，而且正在他们激烈讨论之际，决策者板垣前往旅顺，将此事通知溥仪。2月24日板垣又通知

伪行政委员会，并令他们作为决议通过：“国首”——执政；“国号”——满洲国；“国旗”——五色旗；“年号”——大同。当时，张景惠、熙洽、马占山都已离开沈阳，会议是如何通过的，不得而知。

除操纵汉奸外，还得假造民意，两个方面工作是齐头并进的。在张、马、熙、臧的“建国会议”前，关东军即炮制了所谓“建国促进宣传运动计划”。计划要求县、省、伪满中央都要编造宣传运动大纲，组成特别委员会，作为宣传本部，并指导监督各团体，而特别宣传委员会则由关东军司令部、各地特务机关、伪省政府日本人顾问、自治指导部、伪奉天市政府日本人顾问等所组成。除了利用报纸、广播大造舆论外，还迫使商会、农会、教育会、慈善宗教等团体进行集团宣传。而所谓的“民意”则由县和省以至“全满”大会或联合大会体现出来。但是，计划规定，县一级不要露骨地要求“建国”，省一级要比县明确一些，统一“全满”舆论；“全满”大会和联合会要得出“建设新国家”的结论。宣传运动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在各县团体中进行；第二期各县开大会或联合会，作出决议，通过宣言，选出代表；第三期筹备和召开“全满”大会，组织团体请愿。^①前两期，在张、马、熙、臧会议时期即已进行，2月25日板垣把“国体”“国旗”“国都”等决定告知伪行政委员会并令其通过决议后，26日即把宣传推进到第三期。2月29日奉天市和吉林市分别举行了所谓“新国家成立庆祝游行大会”。关东军导演的拼凑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丑剧和闹剧

① 1932年2月17日驻吉林石川总领事致芳泽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二卷第一册，第371—372页。

开场了。

由于关东军第二师团夺取哈尔滨的军事侵略行动，使原拟的在2月份内把伪满洲国制造出来的计划流产。然而，关东军将三步并两步，在8月初终于使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个怪胎——伪满洲国坠地。1932年3月1日10时，大汉奸张景惠发表了所谓《满洲国建国宣言》，同一天还贴出了“关于国体和国旗”的布告。“宣言”这篇实际由关东军和满铁人员炮制的奇文，不但咒骂“东北军阀”，攻击中国“赤匪横行”，诽谤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和“三民主义”，而且公然伪造历史，胡说“满蒙旧时，本另为一国”。至于伪满政权的施政纲领如何，“宣言”提出了“王道主义”，这在伪满洲国存在的14年间也是叫得震天响的，而其含义更是东北人民所饱尝了的，这就是：屠杀、镇压、掠夺、奴役。应该指出，日本侵略者为了把制造伪满洲国装扮成中国人的自发行动，“宣言”完全回避了“日本”二字；关于伪满“建国”的策划却也成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东南特别区、蒙古各盟旗官绅士民详加究讨”。“详加究讨”确实是进行了的，但不是在中国各族官绅士民之间，而是在日本侵略者内部及其与汉奸之间进行的。

溥仪登场之前就曾发生过这种“详加究讨”的过程。作为一位东方大国的逊帝，他屈辱地跟着外国兵，冒生命危险，像件行李似的被塞进汽车后厢，潜离天津，前来东北，为的就是“重登大宝”，重温一呼百应的帝王美梦。可是，旅顺的3个月与世隔绝生活，不免使他狐疑日重。1932年2月18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虽然没有说明“满蒙新国家”是什么国体，但是溥仪及其近臣们除郑氏父子外都感到震惊。因为，无论从委员会的构成还是从“宣言”的口气看，“新国家”无疑是个

“共和国”。溥仪再也无法按捺了，他写了必须“正统系”的12条理由，令郑、罗二人带给关东军。恰好关东军正命郑、罗二人去奉会谈，会谈的内容又果然是伪满“国体”问题。因为，刚刚结束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意见分歧，没有结论。但对关东军来说已是既定政策。把郑、罗叫来无非是令他们向溥仪做好传达，并无商量余地。当郑、罗二人将溥仪将出任伪满“执政”的消息带回旅顺后，溥仪却暴跳如雷。只有郑氏父子极为冷静，他们进劝“皇上”三思，不可与日本反目。日本侵略者清楚，只有郑氏父子在复辟问题上最为灵活，而他们已向关东军保证，包做溥仪的工作。可是，要想打消一位帝王的复辟欲念是何等之难啊？！1932年2月23日，板垣不得不亲自跑到旅顺面会溥仪。当溥仪情不自禁地询问“国体”时，板垣答称：“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极其激动的溥仪坚持称帝做皇上，而始终不慌不忙的板垣顶多说一句：“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措施而已”。折冲8小时未获结果。板垣拂袖而去时，溥仪满以为自己理直气壮，不甘认输，可当郑孝胥提醒他注意张作霖的下场后，他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了。当天晚上，板垣还若无其事地出席了溥仪的礼节性晚宴，第二天早晨便板起面孔把郑、罗找到大和旅馆，令他们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作是敌对态度”。

由汉奸们恭请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即所谓“请驾”的一幕，是伪满“建国”政治闹剧的高潮。按关东军——导演的要求，“请驾”进行两次。1932年3月1日，亦即“建国宣言”发表的当天中午12时15分，奉天的冯涵清、吉林的张燕卿、黑龙江的赵仲仁、内蒙的苏宝麟、呼伦贝尔的凌陞、东省特别区的保康等6

人^①，到达旅顺“请驾”。溥仪假作“婉辞”。3月4日，“请驾”团扩大到32人。此次溥仪亲读早已准备好的“答词”，表示“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就这样，整整等待了3个多月的溥仪，总算要粉墨登场了。

1932年3月6日午后，溥仪在郑孝胥父子（子郑垂）、罗振玉父子（子罗振邦）、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甘粕正彦等人陪同下，一行43人抵达汤岗子翠阁温泉旅馆，与刚刚到那里的张景惠等10余名“迎接使”会合，然后于翌日上午8时一道乘车赴长。列车停靠在公主岭时，又有熙洽、张海鹏、荣厚等上车迎接。关于3月8日下午3时火车到达长春时的情景，溥仪曾回忆称：“我不禁激动起来，心想营口码头上没盼到的场面，今天到底盼来了。”殊不知，正当溥仪重又飘飘然的时候，长春市的日伪军警倾巢出动，实行特别戒严，并从下午5时起进行全市大搜捕，将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投入狱中。而这是日伪军警各部门3月4日在奉天特务机关议定和部署的。

溥仪就任“执政”典礼在原长春道尹衙门举行，那里破旧不堪，只是仓猝收拾一下。1932年3月9日下午3时，共有130人在那里集会。^②仅用25分钟就完成了由15项构成的会程。汉奸张景惠和臧式毅分别将用黄绫包裹的伪满洲国国玺和伪执政玺捧献给溥仪。然后由汉奸郑孝胥代溥仪宣读了不足百字的“执政宣言”。

① 关东厅警务课的文字资料载为此6人。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载，代表中还有谢介石。

② 汉奸官绅87人，伪奉天省16人，伪吉林省34人，伪黑龙江省8人，东省特别区13人，内蒙10人，溥仪近臣5人。日方包括记者共43人。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马占山、张海鹏、齐王、凌陞等，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满铁总裁内田、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关东厅警务局长林、关东军参谋板垣等均出席。

伪满洲国“建国”闹剧，按编导策划，还有尾声——群众“庆祝”一场，可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拒难以成戏。特别在比较偏远的地区，例如珲春平民百姓全部拒绝挂伪满洲国国旗。驻间岛总领事向日本外务大臣报告称“衷心欢迎其成立者极少。”^①在局子街也发生了有组织抗拒挂伪满国旗的事件。国际反应也是一样。3月11日伪哈尔滨市当局举行“庆祝晚餐会”时，收到请柬的外国领事，除日本长冈领事外，无一人参加。^②

溥仪与本庄繁秘密换文

溥仪就任“执政”的翌日，是伪满政府首脑的“特任式”。一大批汉奸随同溥仪而成为伪满高官。清室余孽、溥仪近臣、复辟派郑孝胥终于战胜对手而夺得了伪满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头衔。在事变和拼凑伪满洲国过程中最为驯服的东北军阀张景惠当上了伪参议府的议长。为了争取态度暧昧、未参加“建国”活动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给他保留了伪参议府副议长的空位。伪参议有：奉天文治派官僚袁金凯、蒙族复辟派贵福^③，清室余孽、郑孝胥竞争对手罗振玉。彻底的亲日派、在拼凑伪政权活动中为侵略者效尽犬马之劳的赵欣伯被任为伪立法院长。至于伪监察院长一职，则给了老牌汉奸、奉系官僚于冲汉。而奉系实力派官僚臧式毅任

① 1932年8月12日驻间岛总领事致芳泽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二卷第一册，第441页。

② 1932年8月12日驻哈尔滨长冈总领事致芳泽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二卷第一册，第441页。

③ 贵福，内蒙索伦正黄旗达呼尔人，清贝勒，1919年任蒙古政厅呼伦贝尔副都统。

伪民政部总长。亲日派官僚谢介石^①任伪外交部总长。马占山被任为伪军政部总长。值得注意的是，事变时投敌叛国最快、替侵略者效劳最力、对逊帝溥仪最忠的熙洽却只捞到个伪财政部总长的职位。其余的任命是：伪实业部总长是吉林亲日派张燕卿；伪交通部总长是奉系文治派丁鉴修；伪司法部长是奉系文治派冯涵清。^②

溥仪签署这个“内阁名单”之后，郑孝胥还拿给溥仪一份文件请其签署。这份文件，和“内阁名单”一样，也是溥仪在旅顺时就过了目的。它是一项密约，是溥仪出任执政而必须签署的卖身契，是溥仪出卖领土主权的卖国条约。而形式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与溥仪的换文。要点如下：

“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即任用贵国人，而其人选委诸贵司令官之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建议，以增减之。

① 谢介石，台湾新竹人，在日本明治大学时与张勋之子结识，1917年参加复辟活动，事变时来吉林。

② 冯涵清，辽宁省盖平县人，事变前曾任奉天铁路局长。

五、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开各项之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①

溥仪在换文上花押的时间写为1932年3月10日，即就任执政的翌日；实际是，3月12日日本内阁通过后3月13日由溥仪签署的。它成了日本阁议决定《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的附件。当时，日本慑于国际压力不敢立即承认伪满洲国。它所采取的方针是：“尽量以非正式的方法与新国家结成事实上的关系（即以私法性契约的形式为原则，例外地也可以采取由帝国派出官宪与新国家或其官宪协议形式），以实现扩充帝国权益，和努力造成既成事实。”^②溥仪、本庄繁换文正是这种扩大侵略权益、造成侵略事实的见不得人的协定，故密而不宣，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后，这笔秘密政治交易才被揭露。^③显而易见，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这项密约性换文，首先把日本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固定化了；其次夺取了铁路等经济大动脉；再就是通过日本人官吏和人事权的掌握控制了伪满的各级政权。所以，它确实是“根本”之所在。而且，这一切在伪满洲国出笼伊始都已成为事实，以后14年间当然更为强化和深化。在以日本官吏控制伪满政权机构方面，在溥仪就任执政的第二天，1932年3月10日就将关东军特务部长驹井德三任命为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伪满政府各要害部门也自始即为日本人官吏所控制，只是未敢立即公布任命。他们是：法制局长松本快，兴安局次长菊竹实藏，参议府秘书局长荒井静雄，外交部总

① 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国关系条约集》，1934年，打印本，第9～11页。

② 1932年3月12日日本阁议决定《伴随新国家成立对外关系处理要纲》，《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二卷第一册，第487页。

③ 溥仪在东京国际法庭作证和在沈阳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受审时，因畏罪隐瞒了这一事实。

务司长大桥忠一；财政部总务司长阪谷希一；财政部税务司长源田松三；交通部总务司长大迫幸男；交通部铁道司长森田成之；司法部总务司长栗山茂二；实业部总务司长牧野克己；民政部总务司长中野虎逸；民政部警务司长甘粕正彦；奉天省警察厅长三谷清。与此同时，还有230名日本人官吏被派进伪满政府各部门。^①

^① 1932年4月16日驻长春田代总领事致芳泽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二卷第一册，第485页。